

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

——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

張惠珍

政治大學中文系講師

中文摘要

林獻堂（1881-1956）出身臺中霧峰林氏望族，歷經清朝、日本殖民及民國政權的更替，一生戮力於臺灣民族運動，其生平事蹟與臺灣詭譎的政治局勢緊密相繫。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林氏偕同二子遊歷歐美，欲效法梁啟超，考察政治國情，以裨爾後推動政治事業。耗時一年之久的環球之旅，足跡遍歷歐美十餘國，旅遊見聞與感思，輯成《環球遊記》一書。這部二十萬言的旅行書寫，既是林獻堂四十九歲壯遊世界的見聞記錄，頗能概括呈現中年林獻堂的識見、學養與思想感情，是研究林獻堂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更是日治時代臺灣人走向世界、尋找民族出路、追求現代化的精神寶錄。遂使《環球遊記》能夠超越一般旅行文本的文學價值，讀來格外沈重，也異常豐厚。因此，本文擬就《環球遊記》的內容詳加析論，藉以彰顯林獻堂的世界觀與國族印象，及其如何透過旅行書寫以再現其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

關鍵詞：日治時代、現代性、國民性、文化想像、國族論述、旅行書寫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National Discussion of Foreign Domains

—Critical Analysis of Lin Xian-tang's “The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Huei-Chen Chang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Lin Xian-tang, from 1881 to 1956, was born into a wealthy family in Wu-fong, Taichung. Having experienced the political turnovers of the Manchu Dynasty,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Taiwan Republic, he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Taiwanese nationalist movement, with the deeds of his lif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agary political situation. After the disruption of the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 in 1927, Mr. Lin traveled around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is two sons, with the intention of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Liang Qi-chao in examining and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stat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so as to impel future political career. The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lasted a year, inclusive of over a dozen countries acros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bining the knowledge and impressions of his travel, he completed the book “The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a way, this twenty-thousand-word voyage is a collection of Lin Xian-tang's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and what he learned, at the age of forty-nine. Generalizing his 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sentiments as a middle-aged man, the

book itself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study of Lin Xian-tang. More importantly, this book is an actual record of how Taiwanes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marched toward the outside world seeking for realiz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Thus, "The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surpasses general travel books in terms of literary value, while being especially burdening, but enriching at the same time, to its readers. Accordingly, my dissertation will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content of "The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urn bring out the world view and national impression of Lin Xian-tang, and how his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national discussion were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travel journal.

KEY WORD : the Japanese occupational period, modernism, nationalism,
cultural imagination, national discussion, travel writing

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

——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

一、前言

林獻堂（1881－1956），譜名朝琛，字獻堂，號灌園，以字行世。出身臺中霧峰林氏望族，為前清舉人林文欽的長子。一生歷經清朝、日本及民國的政權更迭，其生平事蹟，尤復與臺灣詭譎的政治局勢緊密相繫。日治時期曾被總督任命為總督府評議會員，與中部士紳發起捐資興辦臺中中學，更曾多次領導臺灣民族運動，諸如六三法案撤銷運動、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被推選為東京留學生組織新民會會長、臺灣文化協會總理、《臺灣民報》首任社長、臺灣民眾黨顧問、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曾應邀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赴南京參拜中山陵，晉謁軍事委員長蔣中正，並赴西安遙祭黃陵。一九四七年臺灣省政府改組後，任省府委員。由林氏洋洋灑灑的生平履歷看來，除了深受當時權力核心所繫的總督府與國民政府關注外，更多次投入臺灣民族運動，為民喉舌，為爭取臺灣人的權益而出錢出力，足見其人不僅是社會地位崇高的資本家，更堪稱是「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¹

林獻堂在《環球遊記》篇首，即開宗明義自道旅遊動機：「余之蓄志漫遊，於今十有八年矣，爾時攀龍十歲，猶龍九歲，率之留學東京，則發此一願，謂二子若能俱畢業大學，即率之同作歐美漫遊。幸能循序漸進，如願以償，攀龍

¹ 有關林獻堂生平行誼，可詳見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林獻堂先生簡歷〉、〈杖履追隨四十年〉、〈關於林獻堂先生的日記〉、〈林獻堂先生年譜〉、〈林獻堂與梁啟超〉、〈灌老與矢內原先生的交誼〉等文，收於氏著，《臺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頁23-209。

於前年畢業帝大，猶龍昨年畢業商大，即欲實踐吾志以作環球一週之遊。」（《環球遊記》，頁1）既是發願有以促成，適逢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出遊一年可暫避人事紛擾，又可效林氏奉為「良師」的梁任公，遊歷歐美，以考察政治國情，以裨益爾後推動政治事業。在天時、地利、人和諸多因緣契合之下，林氏父子遂有環球之旅。從民國十六年（1927）五月離臺出發，至翌年（1928）五月返抵日本休養為止，此趟耗時一年之久的環球之旅，由兩位公子攀龍、猶龍相伴同行，足跡遍歷歐美十餘國，花費四、五萬圓之多。旅程結束後，記錄旅遊見聞與感思，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始，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為止，在《臺灣民報》連載一百五十二回的〈環球一週遊記〉。由於林氏言行動見觀瞻，復以《環球遊記》內容多涉時事議論，又逢日本已對英、美宣戰，因此《環球遊記》一書，終日治時期，皆未能如願結集出版。²目前收錄於葉榮鐘主編的《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中的《環球遊記》，是林氏一九五六年病逝日本後，由「追隨杖履者達四十年」，擔任林氏通譯兼秘書的葉榮鐘所輯成。³

出身臺灣中部望族的林獻堂，一生戮力於臺灣民族運動，對於傳統漢文化的薰陶習染既深，復承受梁任公新知識、新思想的點化提示⁴，加上出洋遊歷的

² 目前與林獻堂《環球遊記》相關的研究文獻，其中較具代表性者有三：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二期，1998年6月，頁1-33。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收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頁113-164，文津，2000。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臺灣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2002年。

³ 林氏生平所遺詩文有：文集《環球遊記》一種，詩集《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兩種，及《灌園先生日記（1881-1956）》。民國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林氏寓居東京治療足傷，與詩友酬唱，輯為《海上唱和集》。民國三十八年九月至四十五年，以治病為由赴日，自我放逐至客死異鄉，賦詩明志輯成《東遊吟草》。民國四十九年，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除收前三種外，又輯得〈軼詩〉二〇五首，目前為止，已出版八冊（1881-1935）。詳見：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81-1956）》（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0-2004年）。

⁴ 一九〇七年林獻堂與梁啟超在日本奈良旅舍偶遇並結識。時年二十七歲的林獻堂，與維新變法失敗後，留亡海外，暫居日本，時年三十五歲的梁啟超（1873-1929）有過一夕旅舍邂逅與晤談。一九一一年四月林氏更親自接待梁啟超於霧峰萊園作十日遊，彼此並有詩文酬唱。奈良會談中，梁、林正值青壯時期，兩人咸感憂國憂民之思，亟欲力挽狂瀾之志，則如出一轍。對於殖民地臺灣的生靈堪憐，前景堪憂，梁氏慷慨面授機宜。兩人心同道合，梁氏又是維新救國運動中銳不可擋的先鋒型人物，林獻堂在日記中說：「讀《飲冰室文集》，較讀他種小說而更有興味，任公真是我一個的良師也。」（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二》，頁90）

文化驚駭與刺激，林獻堂所撰述的平生第一部旅遊書寫，二十萬言的《環球遊記》，實具深刻意義。首先，它是林獻堂四十九歲壯遊世界的見聞記錄，頗能概括呈現中年林獻堂的思想與感情，是了解林獻堂的珍貴史料。其次，它也是臺灣人走向世界、學習先進、找尋民族出路、追求現代化的精神實錄，實有不可取代的文化意義與歷史價值。因此，本文擬就《環球遊記》的文本內容，仔細爬梳以彰顯林獻堂的世界觀與國族印象，及其如何透過旅行書寫以再現其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

二、西洋鏡裡的文化想像

由於長達一年之久的連續行旅與接觸異國，密集地浸潤在西洋鏡底觀察、想像新世界的文化萬象，促使來自殖民地臺灣的林獻堂，不斷透過感時憂國的心與眼，與其先備知識產生比較與省思。其關注與聚焦之所在，尤其鎖定在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相關問題上。於是，先進／落後，現代／傳統，西方／東方，殖民主／被殖民者，諸多因為現代性所衍生的時空落差與文化差異，透過參差對照，反覆出現與對話，不斷在文本之中相映成趣。

（一）民族性、國民性的比較

旅行者初抵他者之域，在異時空、異文化的新鮮刺激之下，感官能力總是相較原本熟稔之地來得敏銳許多，文化差異自然源源不斷地透過西洋鏡折射出來。首先，林獻堂從人在異國的飲食經驗中，觀察並提煉出西方人與東方人民族性、國民性的差異。當林獻堂初抵錫蘭，與一群觀光客分乘四部汽車進行市區遊覽，同車五人中的一名英國婦人，無視於同車之人的反應與車隊之行進，只顧個人腹飢，遂令司機停車以便覓食充饑，「彼自緩緩嚼麵包，此則歐洲人與東洋人大異之點也。設使東洋人，不論男女必皆能忍耐，而他獨不能，所謂個人主義者，是耶非耶。」（《環球遊記》，頁4）這一不可思議的現象，看在來自講究集體主義的、東方的「禮教之邦」的林獻堂眼裡，姑且不論是個人教養，抑或是社會習慣，自然聯想為西方與東方的文化之大異者——個人主義所致。

前後斷斷續續寓居巴黎幾近三個月之久，「而未嘗感著厭倦，反覺其趣味不盡」的林獻堂，雖鍾情於巴黎，並許為「平生所愛的都市」（《環球遊記》，頁 28），但是對於用餐時，西方婦人各帶愛犬相隨的異國飲食風景：「她撫摩犬首，並不洗手隨即取麵包而食之，既而待役以饌進，犬聞美味鼻孔大動呼吸甚急，離其所食之饌不過咫尺，其呼吸氣可以直貫盤中，她則刀叉並下而大嚼，毫不以為意。」（《環球遊記》，頁 28）林獻堂雖不致倒足胃口，卻也不敢苟同地感嘆：「英法中流以上婦人，愛犬比愛其孩子更甚」，「誰謂西洋人的衛生思想個個皆發達也」！見巴黎有名餐館座無虛席，西人無分男女老少俱候位以循序漸進，林氏反思：「此事若是東方人，一定不願如此，一聞客滿員即掉頭不顧而去矣，他們則不然，因專工至此，其目的未遂，決不肯捨之而去，此事雖小，亦可以看出東西民族性之躁急與能耐也。」（《環球遊記》，頁 28）此外，林獻堂觀察隔座德國人同桌用餐，食畢算帳，命服務生精算各人消費金額，再各自付錢分攤的買單情形。令人初睹頗嫌其吝，進而推想此事若是日本人，必將約取各人消費金額，設使略有增減，亦不較锱銖；若是中國人，必定要獨自一人負擔，決不肯在席間攤算而示人以小氣也。後來細思此事，「三者各有其好處，惟在於久暫之間耳。若是一時的，則當學中國人，若是暫時的，則當學日本人，若是同作長期的旅行，則當學德國人，蓋朋友相處愈久，凡所有金錢關係，亦必要愈分明，庶免為此阿堵物而害及友情也。」（《環球遊記》，頁 28）不同民族在金錢觀、價值觀上的衡量，自有其取捨，也充分反應民族性的差異，針對德國、日本、中國人的處理方式，林獻堂未遽論短長，慎思之後而有一番因勢、因人制宜的詮釋。

國族歷史的考察，讓旅行者可以跨越當下的時空，進一步聯結考察對象的前身與今世、過去與現在，甚至還可以對照旅者所來自的國族，產生凸顯文化差異與歷史教訓的效果。早在十七世紀中葉即有「歐陸戰場」之稱的比利時，先後歷經西班牙、奧地利、荷蘭、法國的殖民爭逐，直到一八三九年始與列強締結中立條約，被承認為永久中立國。然而一九四一年秋，德國在歐陸掀起世界大戰，欲強行借道比利時以入侵法國，「比利時為保持其自由與獨立，而不惜犧牲一切以衛之。若以東方人之眼光視之，必笑其愚，謂其所得不償失，設使

他若情願將其土地借給人家作戰場，而自己則可在其中望收漁人之利。噫！東方人所愛者是利，西方人所愛者是自由，愛利之人，若以利誘之，雖為奴隸亦所甘心，自由之人，則『不自由毋寧死』此則東西之所大異之點也。」（《環球遊記》，頁 63-64）比較同屬西方文明的英、法兩國的國民性，林獻堂在遊記中曾引述法國學者所言：「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上，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作一回事。」然而，林獻堂卻另有一番見解：「他說這話，想是欲刺激其國民以作一種的興奮劑，我想作事勤勞敏捷，自有其敏捷的好處，作事從容不逼亦自有其從容的妙處。」（《環球遊記》，頁 29）林氏此話並未遽作孰優孰劣的定奪，然話鋒一轉，他以同是國際性都市，各色人種共同生息於此間，分別代表英國和法國的首都倫敦和巴黎為例，兩者「絕不抱有人種的偏見，人人皆能自由」，故世人多兼愛兩者。來自殖民地臺灣的林獻堂，在此不免油生無涯之感慨。他一方面肯定西人能秉持種族平等，重視人權自由，另一方面則隱含對於總督府治臺政策的針砭之意。在林獻堂即將結束八個多月的歐洲之旅，自巴黎赴紐約前夕，他不禁回想在歐洲遊歷過的名都大邑不下數十處，「然就中最深刻的，則莫如巴黎，余愛巴黎非僅愛其華麗，實亦愛其質樸，而又對有色人種毫無差別也。」（《環球遊記》，頁 73）林氏對於巴黎人、倫敦人的不抱持種族偏見，人人皆能享有自由，再三致意，其欲「藉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想法不言可喻。

置身於先進、現代化的西方世界裡，林獻堂痛切反省國族積弱與國勢頽敗之因，追究根本乃在華人民族性的問題。清末民初國人的一系列關於國民性、民族性的論述，實與西方科學和現代思潮的引進中國關係密切。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進化論」（Evolutionism）與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正籠罩當時中國思想界。嚴復於一八九八年譯介「天演論」，梁啟超則進一步衍繹「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定律，化生物生存競爭為國族生存競爭的「新民論」⁵，

⁵ 1902 年梁啟超發表長篇政論《新民說》，闡述「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而「新民」涵義在於提高民德、民智、民力，必先使中國人民取得「可以為一國國民之資格」，然後始能立足於今日之世界。其中〈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深刻應用在維新救國運動上。林獻堂與梁啟超淵源甚早，任公著書立論對於林獻堂的政治思想與爾後開展的臺灣民族運動，俱頗富影響力。⁶當林獻堂旅行美國時，腦海中即浮現梁啟超一九〇三年至北美旅行考察的記錄——《新大陸遊記》的印象與觀點。因此，他不憚其煩地在《環球遊記》中長文引述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論中國人之缺點》一節的說法⁷，認為梁任公直陳華人不及西人之處，頗中肯綮，可「作吾人之龜鑑」。梁文論及中國人做事不講效率，不懂休息乃人

一文中，梁氏認為：「凡地球民族之大別五，聞其最有勢力與今世者誰乎？白色種人是也。……白人之優於他種人者，何也？他種人好靜，白種人好動；他種人狃於和平，白種人不辭競爭；他種人保守，白種人進取。以故，他種人只能發生文明，白種人能傳播文明。……其勇猛果敢、活潑宏偉之氣，比諸印度人何如？比諸中國人何如？……白種人所以雄飛於全球者，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接著，梁氏並「舉吾國民所當自新之大綱小目」，列示中國人所缺如下：一、中國人缺乏公德心。二、中國人無國家思想。三、中國人無進取冒險之性質。四、中國人無權利思想。五、中國人缺乏「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六、中國人缺乏自治之能力。七、中國人保守性質太強。八、中國人無自尊心。九、中國人不能群。十、中國分利之人多，生利之人少。十一、中國人無毅力。十二、中國人無義務思想。十三、中國人缺乏尚武精神。

詳見鍾叔河，〈啟蒙思想家梁啟超〉，頁390-392，收於康有為、梁啟超、錢單士厘著，《走向世界叢書：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新大陸遊記及其他·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岳麓書社，1985年），頁390-392。

⁶ 葉榮鐘引述時任林獻堂秘書，隨林氏往遊日本的甘得中的回憶，認為林、梁二人於1907年在奈良的初遇，對林獻堂的影響相當深遠。當天兩人筆談中，林氏曾就臺胞爭取自由問題，向任公請益，任公示以：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臺胞，警告臺胞切不可輕舉妄動，而有無謂的犧牲。最好效法愛爾蘭人對付英國的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的顯要，以牽制臺灣總督府。任公並書：「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夕之遇，誠非偶然。」林氏大受感動，幾至掉淚。葉氏認為，任公之議，「乃是尊定臺灣民族運動的大方針」（同註1，〈林獻堂與梁啟超〉，頁200）、「林獻堂所採取的路線，完全是遵照梁任公所授的策略」（同註1，〈初期臺灣議會運動與日總督府的態度〉，頁187），甚至「灌公的政治思想與民族意識，說他是由任公予以開眼也無不可」（同註1，〈林獻堂與梁啟超〉，頁201）。1911年春四月，任公一行應邀來臺十餘日，有盤桓菜園四日之遊。任公勸告林氏及櫟社同仁，不可「文人終身」，必須努力研究政治、經濟及社會思想，同時開列日本書籍一百七十餘種，席間所詠律詩四首，詩中「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之句，「震動一時，不脛而走，傳遍全臺各個角落」。且自任公來臺之後，「理想、現實、目的、手段」等新名詞，逐漸出現在年輕人的談話間。（同註1，〈林獻堂與梁啟超〉，頁203）。

⁷ 任公1903年到北美旅行而有《新大陸遊記》。遊記首章〈由橫濱啟程〉即自道「蓄志遊美者既四年，……前所作〈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所謂『逝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明白揭示梁氏此行的目的。緣此之故，〈凡例〉中亦自道：「中國前此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無關宏旨，徒災棗梨，本編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刪去，無取耗人目力，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焉。」（頁419-420）至於〈論中國人之缺點〉一文，對於中國人之民族性則多所批評（頁555-562）。以上諸文，皆收錄於康有為、梁啟超、錢單士厘著，《走向世界叢書：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新大陸遊記及其他·癸卯旅行記·歸潛記》（湖南：岳麓書社，1985年）。

生要事，「中國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則無休息實屬其咎。」其次，談到行路姿態，「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則一命而僵，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西人行路，腳步無不急者，一望而知為滿市皆有職業之民也，若不勝其繁忙者然。中國人則雅步雍容，鳴琚佩玉，真是可憫。」再就言談來看，西人講話之發聲高下，皆應其度，甲語未畢，乙無攏言；中國人則聲浪淆亂，「真可為無秩序之極」。從作息、行路到談話，一一比較西方人與中國人，所得的結論竟是「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環球遊記》，頁 92）梁啟超、林獻堂始終還是將革新求進，大刀闊斧的矛頭，對準中國人。二人在字裡行間流露的恨鐵不成鋼與沈痛悲憤，直是令人怵目驚心。回置到當時國祚危殆的情勢下來看，梁、林二人對於中國民族性的批評，實乃沈痛醒世之文，然而異時空看待，縝密尋思後，則稍嫌言過其實。較之西方人、日本人，中國人缺乏公德心、法治精神是事實。至於說西人昂首疾步，中國人僵散漫真「自慚形穢」，此論猶有可取。然而，說中國人行路「雅步雍容，鳴琚佩玉，真是可憐！」就不免苛責太甚。對照林氏在比較英、法人國民性時，還能客觀評道：「我想作事勤勞敏捷，自有其敏捷的好處，作事從容不逼亦自有其從容的妙處」（《環球遊記》，頁 29），此處卻另以嚴苛標準批判中國人，想是「愛之深，責之切」使然吧。

論及中國人的民族性，林獻堂所取資的梁文觀點如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部分見諸於梁文，卻遭林氏捨除未取的文章內容。舉凡梁啟超所臚列的中國人的缺點分別有四：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四曰無高尚之目的。梁任公觀察舊金山華人社會而以小喻大：中國社會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故華人所聚的都會無不凌亂脫序，凡此皆中國人能為族民不足為市民的證明；中國人有愛家族之心而無愛國觀念，故難成一鞏固之帝國；中國人之議事，可謂為「暴民專制」，因議事而攘臂操戈者數見不鮮；中國人選舉時，益有令人失驚者，「往往殺人流血者，不可勝數」，故中國人保守心太重，尚無享受自由、自治、立憲共和的資格，數十年後而後可；中國人「其所營營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現在，凝滯墮落之原因實在於是。」缺乏追求歐美人高尚之目的，亦即泰西

文明發達三要素——好美心、社會之名譽心、宗教之未來觀念。「吾未見內地人之性質，有以優於舊金山人也，……以舊金山猶如此，內地更可知矣。」來自封建、落後的中國社會的華人，一旦放置在進步、文明的歐美社會中，其對比之強烈不言可喻。欲以西人為師的梁啟超，他這段激刺、振奮國人痛定思痛的文字，固然可以收振聾發聩的效果，然而一旦落入臺灣總督府官員們眼中，豈非正中下懷，恰可為統治者一貫主張的臺灣人無自治能力的說法背書。況且，如果林氏全文遂錄「良師」任公上述觀點於個人文章中，這對於畢生戮力於臺灣民族運動，追求臺灣人自治的林獻堂來說，豈不是自相矛盾，自動繳械投降！兩岸情勢大不同，面對氣焰囂張、文字檢查頻繁的外來統治者，樹大招風的林獻堂自然不得不格外戒慎恐懼，以免落人口實。林獻堂亟欲反省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臺灣人的國民性，進而鞭策國人覺醒、上進的焦灼之心與梁任公同出一轍。但是相較於流亡異域，大可放言高論的任公，身處殖民地臺灣的林獻堂，其人臨淵履冰、動輒得咎的處境則更形窘困。

（二）現代性的商榷

相對於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突飛猛進，東方的扶桑島國日本，也在明治維新後，成功地「脫亞入歐」，躍居亞洲現代化國家之首，甚至從閉關自守的大清帝國手中奪得戰利品，入主臺灣，擴張版圖。中國人也好，臺灣人也罷，拜現代化的相對遲到所賜，自然對於現代性產生愛恨交加的矛盾與複雜心情。林獻堂有幸走進現代化國家之林，現代性不再是傳聞中的想像而已，更何況在參差對照下，現代性尚可析分為：歐美民主國家「先進的現代性」、日本軍國主義式「異樣的現代性」，和殖民地臺灣「遲到的現代性」。當東方／傳統／落後，撞見西方／現代／進步，一旦日本／殖民主義的現代性，與歐美／民主主義的現代性撞擊後，林獻堂的應對與感受，令人期待。

香港，是林獻堂「登陸」現代性的第一站。從「百年前住著惟有漁人數十家，以自樂其桃源」；經一八四一年英清鴉片戰爭後，兩國締結南京條約，清國割香港為英國所有；一八五六年復有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北京條約再讓九龍半島之部分予英國；一八九八年英國挾其強勢再威逼清廷改正條約，將香港及九

龍半島之全部盡畫入為期九十九年租借權的範圍。「八十餘年來，英人之經營不遺餘力，其蒸蒸日上，實大有令人可驚。」然而，當林氏父子登上太平山之最高峰（海拔一千八百公尺），得知「英政府有禁止華人，不能住過海拔七百尺以上，謂華人不潔，又善叫囂之故。」不得不有感而嘆：「噫！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環球遊記》，頁 278-279）蓋華人屋舍街衢的骯髒雜亂，相對於英人的整飭清潔；華人居處的嘈雜喧囂，相對於英人的靜謐井然。英國租界地香港，強有力地宣告了現代化的驚人成果與對比。

抵達英國之後，接觸到英國的民情風俗與環境氣候，讓林獻堂親眼見識，也深刻體會到，民族性之強韌，不僅有賴天時地利，更重要的還在後天的人為的促成。例如運動可以養成強健的體魄：

欲保持身體之健康，非藉運動不可，是以英人拿室外運動競技諸事，當作人生日用必需，成為公共嗜好。因此養成其堅忍奮鬥之精神，沈鬱凝重之性格，英人得有今日，未必不是受此不良氣候之所賜。……凡遇環境有些苛酷，這正是要鍛鍊汝身心，玉成汝事業也。（《環球遊記》，頁 9）

運動習慣的養成並蔚為社會風氣，看在沒有現代化運動觀念的臺灣人林獻堂眼裡，因意識到國民體魄之健全，乃國家富強之基礎，故相當肯定與認同。至於在敦倫搭乘地下電車的過程中，林獻堂發現或坐或立的乘客，總有七成以上手執報紙，以讀新聞，他體會到：欲知一國國民智識程度的高低，先查其能否讀新聞的人數之多寡，諒當不至大謬也。而車中乘客見有老弱婦孺，則必起立讓位的「美風」，較之先前在東洋，「每見一種半開化之人，在車中或偃臥或將行李置於座旁，一人佔數人之位，不管他人如何，若與此比較，真成霄壤之差。」（《環球遊記》，頁 14）西方／現代／新的國民，與東方／傳統／舊的國民教養相較之下，不禁讓林氏感嘆此一善良風氣，「豈惟文明人所獨有耶？」而親赴世界議會政治最早發達的英國國會參觀，並且旁聽上下議院議事的運作，林獻堂見當天旁聽席幾無立錐之地，尤其婦人佔有十分之六，而六百一十五位議員之中，有女性議員八人，其中甚至有一名為女優出身。這對「視女優為一種玩弄物，自來不以藝術家看重之」的東方人來說，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也使林獻堂

充分體認到英國婦女不僅關心政治，更實際參與政治。旅英期間，林獻堂就英國「上自君主，下至民眾，無分貴賤，一視同仁」的平民精神，最是「欽仰不置」（《環球遊記》，頁 11）。此外，對於英國王室的親民愛民也留下深刻印象：聽聞英王喬治五世，參加蘇格蘭教會舉行的募款義賣活動，英王賣花，王后賣肥皂；英王散步途中，為遺失玩具熊的孩童，代為找回失物，使孩童破涕為笑。林氏觀此二事而謂：「真可謂皇帝民眾化矣，將來君主國的壽命之最長久者，其英國乎！」（《環球遊記》，頁 20）在倫敦海德公園的「講演會」的逗留，當日話題有宗教、政治、經濟等不一而足，論者、聽者反覆辯難，甚至「兩者皆以堂堂之態度攻擊政府」，「余深服其從容不逼，無怒色，不作無禮之言相嘲謔，真有大國民之襟度也。……每談一段，千數百的聽眾喝彩贊成之聲不絕於耳，有警察四五人，遙遙而立，概不干涉。」更令林氏大開眼界，直呼「真是言論自由」！（《環球遊記》，頁 13-14）

觀屠殺之悲慘，使人生不忍之心，觀職工之作業，又使人生無窮之感。近世之文明國，皆以人為機器，且以人為機器之奴隸者也。以分業之故，凡工人之在工場者可以數十年立定於尺許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執之業，或寸許之金，或寸許之木，磨礱焉，控送焉，此寸金寸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聞也，至於理想學問，更無論矣，以是之故，非徒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已，抑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也，嗚呼，文明國之所以為文明，果如是也耶。（《環球遊記》，頁 87）

來到國勢蒸蒸日上、高度現代化的美國，映入眼簾的一幕幕先進的現代性風景，看得林獻堂驚心動魄，目瞪口呆。標榜科學、理性與經濟效益的現代文明，因為機器化、專業化考量下而造成細密的職能分工，人人成了社會、國家機器中的小小螺絲釘，異化成為機器的附屬零件，究竟是人在驅使機器，還是人成了機器的奴隸？其實是掌握生產工具的少數資本家才能驅使機器，大多數的中下階層的勞工，都成了為資本家創造利潤與奇蹟的現代化奴隸。來自雷厲風行推動殖民主義式的現代化的臺灣，具有資本家身分的林獻堂，秉持人道關懷的立場，使他能夠超越階級立場，發出了對於所謂高度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

的質疑。至於美國境內弱勢族群的處境，林獻堂針對黑人、印第安人與婦女問題也提出了個人的觀察與看法。當時「黑人之在美國各州，約有一千二百萬，然居於北方者較少，居於南方者較多，但居於北方者，既多貧寒，復至不潔，而黑白二種積不相能之態漸甚」。在白人當權主政的情勢下，白人在政治上採取不平等對待，以排斥黑人的選舉權，俾收抑制黑人取得社會優勢的可能，再者黑人教育水準普遍低於白人，以致失業問題、經濟問題嚴重，間接造成社會治安問題。有鑑於美國社會中黑人問題的層出不窮，林獻堂認為：「黑人欲使其民族之繁榮在此二十世紀生存競爭最劇烈之時，而不為劣敗者，豈僅衛生而已哉，蓋經濟、教育，其尤為目前之急務也。」倘若，黑人復能夠團結群力以力挽狂瀾，「白人豈能仍視之以奴隸，而高枕無憂也」。（《環球遊記》，頁 75-76）此外，他還以林肯解放黑奴為例：「黑人之能得自由，究非自己之力所致，不過仁人君子，憫其呼天籲地之苦，而為之解放耳，黑人雖得自由，余則甚為黑人慚愧。」（《環球遊記》，頁 84）再就美國境內原住民印第安人來看，人口總數已從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移民先祖初履斯土時的三四百萬人，銳減至今殘餘不過百分之三四而已，林獻堂查其銳減之因有二，一為白人戰爭虐殺，二為生活困難，不能繁衍子孫所致。林氏認為後者影響之深遠尤鉅，「戰爭虐殺，不過一時之事，而生活困難，實為終身最大之苦痛，此後若無補救之法，則直至於滅種，豈不哀哉。『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為自然淘汰，若不欲為劣敗者，當三思其補救之法而努力行之也。」（《環球遊記》，頁 88）林獻堂對於美國境內弱勢族群的觀察，其一貫抱持人權自由與平等的立場，同情其民族處境，並覺察教育與經濟乃根本性問題，二者關乎人口素質、社會競爭力的提升與永續發展民族命脈的可能。時處原住民意識尚未抬頭之際，在白人當家的國家機器操作之下，其實那一隻隻看不見的「白手」，才是迫使印第安人瀕臨滅種的主因——亦即美國的原住民政策，才是始作俑者。這樣的事實，不僅林獻堂看不見，恐怕連深受其害的印第安人也未必察覺。這是國家公權力的傲慢與專斷，也是弱勢族群的悲哀，美國境內的種族衝突問題，其實也是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遺毒。種族生存的競爭實不能簡化、等同於自然界物種的生存競爭。可惜，當時福利國家的觀念尚未發達，因此林氏未能把問題禍首指向政府當局，而僅將重點放在鼓

吹弱勢民族的對內團結與自立自救。

美國婦人之地位，在萬國中，比較的為高，試舉數端如下。凡男子相遇於道中，點頭而已，惟遇婦女，則必脫帽為禮。在昇降機室中，一婦女進，則眾皆脫帽。地中電車，坐位既滿，一婦女進，則眾皆脫帽。地中電車，坐位既滿，一婦進，男子必起讓坐。繁文縟禮，如見大賓，然此不徒對於上流社會為然，即尋常婦女亦莫不如是也。女尊男卑之風，非僅遊美者之言，即美國人亦自謂然也。故有恒言曰，「欲驗一國文野程度，當以其婦人之地位為尺度。」試觀亞洲婦人之地位，較之歐美，實大相逕（逕）庭，故亞洲文明不能與歐美並駕齊驅，其信然也哉。（《環球遊記》，頁 92）

就婦女問題而言，林獻堂遍遊諸國之後，對於美國婦女地位的居萬國之首，印象相當深刻。惟林氏僅就美國社會形式上的尊重、禮遇婦女來看，未從教育、經濟與政治諸方面多作實質了解。一國婦女地位高低的鑑別標準，恐不能單從表面上男女應對的態度來遽下論斷。林氏雖以「繁文縟節」來評介美國式虛張聲勢的所謂「男尊女卑」的社會風氣，然而他畢竟還是充分肯定以婦女地位的高低，作為評斷文明文野程度的尺度，甚至還指稱亞洲婦女地位的普遍低落，乃是亞洲文明不如歐美現代文明之處。

在環球之旅進入尾聲之際，浸染歐美現代文明近一年光景，充分享受自由幸福之餘，林獻堂登高望見太平洋的煙波浩蕩，觸景生情，意識到歸期屈指可數，重入牢籠之日無幾，遂生無限感慨與悲哀：

屈指歸期，由此出發，十七日之航海，則可以抵橫濱，再三日則可以抵故鄉矣。遙憶與諸親朋別後，倏忽之間，行將一年，相見在即，欣喜實似焉。繼思在此自由天地，無束縛，無壓迫，「我無汝詐，汝無我虞」，得以共享自由之幸福，不亦樂乎。然匆匆竟欲捨此以去，而即樊籠，其故何哉？言念及此，不禁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矣。（《環球遊記》，頁 91）

倦鳥戀舊林，遊子思故鄉，乃人之常情，回歸出發的原點乃旅程結束之必然。

然而，林獻堂吞吞吐吐，欲語還休，未能道明近鄉情怯，憂從何來，只是兀自眷戀著耽溺著叨絮著「自由天地」的「無束縛」、「無壓迫」、沒有爾虞我詐的種種幸福美好。最後，托出一個大哉問：誰會甘願捨此自由之幸福而歸就樊籠？這雷霆萬鈞的一問，直是道出了殖民地臺灣人身不由己的悲哀。當東方／傳統／落後，撞見西方／現代／進步，一旦日本／殖民主義的現代性，與歐美／民主主義的現代性撞擊後，林獻堂的激動與感慨，令人歎歎不已。

三、取鑑西方以建構國族論述

此行偕二子西遊取經的林獻堂，遍遊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丹麥、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瑞士、美國等十餘國。凡抵文明先進國家，透過自我與異己的交流和對話，除了留意觀察東／西方文化之異，商榷現代性之利弊與國民性之長短外，尤其留心於前殖民地國家，成功獨立建國的政治經驗和歷史教訓，以為前車之鑑。對內，一則批判滿清政權的腐敗無能，亟思砥礪臺灣人謀求自治自救；對外，則將矛頭指向挾軍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君臨臺灣的日本統治者，其教訓之意，不言而喻。

（一）吸納獨立建國的歷史教訓・反思日本殖民的欺罔性

「夫獨立之成功，非自其運動開始之日便能成功，亦非其成功之日，始見有獨立之運動也。埃及今日能得獨立為立憲國之地位，實自最近四十年國民奮鬥之結果也。」（《環球遊記》，頁7）林獻堂以埃及前後兩次獨立運動為借鏡，分析前次領導人默罕默德阿利雖雄才大略卻未能成功，而一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領袖查遇爾爾率領的獨立運動竟能大功告成，迫使殖民國英國於一九二二年宣布拋棄保護權，承認埃及享有獨立國主權，關鍵實在於「阿利之獨立運動，係彼一人之事業，殆與國民無關涉焉」，而「查遇爾爾則以國民為後盾，不屈不撓前仆後繼，不知洒許多少志士熱血於荒煙沙漠之中，乃得有今日也。」（《環球遊記》，頁7）林氏從埃及獨立運動學會的教訓是：獨立運動須賴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不屈不撓前仆後繼，唯有如此，始能形成氣候，大功告成。

愛爾蘭獨立運動，更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奮鬥。英國對於鄰國愛爾蘭垂涎已久，從十五、六世紀開始，英王亨利八世（1491-1547）便以征服者的姿態掌控愛爾蘭，派遣大批新教徒移民至愛爾蘭，藉以同化當地人，並逐漸取得絕對優勢，甚至立法剝奪愛爾蘭人的土地、宗教、政治權與社會地位。一八〇一年英國片面頒布「國家統一法」，將愛爾蘭政府完全置於英國宰制下，英人對愛爾蘭的控制達到最高峰，相對的，愛爾蘭人從此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受到美國獨立運動影響，愛爾蘭人嘗試尋求自治自主，從爭取愛爾蘭國會的獨立，經過解放天主教徒運動，到宣揚愛爾蘭民族主義，追求完全自治、脫離英國宰制的獨立運動，直到一九三七年頒佈「愛爾蘭憲法」，正式宣告愛爾蘭成為獨立共和國。其間犧牲的仁人志士不可勝數，甚至因為路線之爭，導致政黨紛爭。看在世仇的英國人眼裡，自然不免酸葡萄心理作祟，而一廂情願地覺得：「除上帝之外無人能救得愛爾蘭」。對此，林獻堂卻頗不以為然地批評：「此是英人感情的批評，果真愛爾蘭無自治之能力乎，這豈不是笑話。」（《環球遊記》，頁 21）

群策群力，「有志者事竟成」的例子，不勝枚舉。埃及、愛爾蘭的脫離英國殖民如此，比利時的以小搏大，抗拒暴政、宣言獨立，亦復如是。從十七世紀中葉始，因強鄰環伺，先淪為西班牙附庸，繼而被奪於奧地利，後歸於荷蘭，再被奪於法國，復被併於荷蘭，數百年來輾轉殖民的慘痛經驗，使比利時人尋求永久中立，直到一八三九年，終於如願以償。一九一一年始發佈「摩納哥公國憲法」，宣佈脫離法國而獨立的摩納哥公國，號稱是「世界最小的自治國家，又是世界最大的賭博國家。」，「觀其市街整齊清潔無齷齪危險之家屋，無衣服襤褛失業之遊民，其能治理若是，真是使人欽佩不置。」（《環球遊記》，頁 36）小國寡民的摩納哥公國，成功脫離法國的附庸，堅持獨立自治的結果，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使得林獻堂欽羨不已。國土面積的大小，與自治能力的高低，未必成正比，從比利時和摩納哥公國的實例上，林氏更見證了這項事實：

余觀摩納哥公國，其土地之小，其人民之寡，其出處之稀微，竟能治理其國家若是，可見世界上無一土地、無一民族不可獨立的，唯視其自治能力何如呢。若其民族沒有自治的能力，如印度之大，沃野千里，

稱為天府之國，徒供人家作殖民地罷了，豈不可哀嗎？（《環球遊記》，頁 36）

抵達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義大利，目睹一處處歷史陳蹟，翻開一頁頁英雄豪傑的豐功偉業史，因亡國而悲鬱的林獻堂，流連忘返之處，既不是義大利南部一個最美麗最繁盛的通商港口，「海上遙望，恍如蓬萊宮闕」的那波里（Napoli），也不是偉大麥第奇家族獎勵扶植，號稱中世紀歐洲文化藝術中心的花城佛羅倫斯（Florence），更不是建築華美壯麗，運河拱橋縱橫其間的「奇怪不可思議之都市」威尼斯（Venice）。而是建城於西元前七百五十四年，極盛時期號稱「永恆之城」、「世界的首都」，「其全盛時真如萬水朝宗，條條之路皆到羅馬」的羅馬城（The Roma city）。登查尼邱蘭坵以俯瞰羅馬城，「余在此坵上流連久之，而胸中磅礴鬱積之氣，直欲超此軀殼凌空而上呢。」（《環球遊記》，頁 38）此地究竟為何值得林氏駐足不去，再三眷戀？正是中興義大利三傑之一的加里波的（Garibaldi）將軍銅像所在之故。羅馬帝國盛極而衰，因驕奢荒淫而敗，因異族入主而亡，幸有愛國志士不屈不撓，沈毅堅忍，在三傑的領導之下，終能促成統一義大利的中興大業。

羅馬在四世紀以前為歐洲最文明最富強之國家，因以自滿自足驕奢，以致內政之不修外侮之憑凌，至是而不滅亡已不可得矣。一旦滅亡，異族入主奴隸之、魚肉之，而又不能團結以抗外敵，反而自相殘賊遂成四分五裂不可收拾者千餘年。幸而有厄曼紐二世之明，嘉富爾之賢，加里波的之勇，又有無數愛國之士，為其前驅苦心孤詣奮鬥數十年，乃能成其統一之事業。嗚呼，欲亡一國家非一朝一夕之事，然欲建設一國家又豈一朝一夕之事哉。（《環球遊記》，頁 39）

「凡國家之能獨立與否，先視其國民有無獨立之精神，若其國民有獨立之精神，雖羅馬之亡仍能成為意大利之統一，若其國民無獨立之精神，如猶太永為人牛馬奴隸。」（《環球遊記》，頁 38）義大利何其有幸，有此三傑領導中興復國大業，而正處於國祚覆亡，異族入主之際的日本殖民地臺灣，豈能只是氣息奄奄，

坐以待斃？林氏遊歷羅馬之際，適逢朝鮮李王來訪義大利，義人於其下榻處掛旗以表敬意。林獻堂將殖民地朝鮮李王，對比統一義大利之撒丁尼亞王厄曼紐厄爾（Emanuel）二世，而提出嘲諷：「今日朝鮮李王覩厄曼紐厄爾二世之銅像，未知其作如何之感想？」（《環球遊記》，頁 38）時值穆索利尼（墨索里尼）崛起政壇，為現代義大利國粹黨黨魁，並成為首相，政權獨攬，行專制政治已達七年之久。有一英籍婦女以手槍暗殺未遂，遭逮捕審問，謂與穆索利尼並無仇恨，只是惡其專制而已。就此事件，林獻堂不禁感慨：義大利四千餘萬之國民，皆甘心屈服於恐怖暴政之下，反而由一毫無關係的英婦代為報復，足見現代義大利國民之程度與英國國民程度相去何啻霄壤之差。

故凡專制政府，皆不欲其國民有高等知識，蓋恐其有知識，則能批評攻擊，甚至出於反抗，而彼專制政府何能永久把持其獨裁政治耶。……適二英國婦人同車，她亦來旅行，將欲歸去，雜談之間，她謂意大利國民甘屈服於專制之下，令人百思不解其故，言時頗露鄙薄不屑之狀。余聞之深為意大利國民慚愧，亦以自愧也。（《環球遊記》，頁 48-49）

國民智識程度之高低，與一國之教育制度關係密切。林獻堂從義大利看臺灣，不僅為現代義大利國民的甘為專制政權所奴役而感到慚愧，更為臺灣人淪為殖民地的次等國民而感到悲哀。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專制統治，落實到教育制度上，即明顯採取重日輕臺的歧視政策。臺灣近代學校教育一向是臺灣總督府所標榜的「卓著政績」，然而差別待遇卻抑制了臺灣人的人才發展，同時在仕途上的限制政策，也造成臺灣人始終處於被統治地位，而永無翻身之日。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出版於一九二九年的研究論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即明白揭穿了日本殖民者的居心：「日本佔領臺灣的最初二十五年間，統治的權力大部分放在經濟方面，對於教育並不重視。國語教育與醫學，這是在臺灣統治的實用上所能容許的全部教育。……臺灣人不但在臺灣沒有接受專門教育的機關，直到一九一九～二〇年前後，即去日本留學（特別是學法律政治），也受政府干涉。……除了醫學專門學校及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其他一切高等學校，都在日本舉行考試，以謀吸收日本學生。這些結果，當然是由日本人佔了各高等

程度學校的大部分學生。名為教育制度的同化，實則近乎使臺灣人被剝奪了高等專門教育。……使日本人取得指導者與支配者的地位。」（矢內原忠雄，頁172-177）⁸

來到位於法國東部與德國接壤處的重要城市南錫（Nancy）與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二城分屬法國洛林、亞爾薩斯二州的首府。亞、洛二州為德、法數百年來國土紛爭的焦點，其主權究屬誰方為正當，實難以論斷。由於歷史命運的糾葛，兩州幾番輪轉於德、法之手，若論沙爾曼大帝裂土分封時，這兩州本是分給德國的，至一五五二年兩州小諸侯要求脫離德意志而獨立，乃求法國保護，是為問題發軔之始。其後經過無數大小戰爭，迨至一七六九年始完全併於法國。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割還德國，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後割予法國，究竟誰是光復誰是侵奪？總之，一八七一年割還德國時，亞爾薩斯人固守四十餘日，到糧盡械竭始勉強投降，而一九一八年交予法國時，則沒有嬰城固守勉強投降的事。可見二州的民心傾向法國多，而歸向德國少。為什麼要傾向法國呢？基本上，林獻堂同意梁任公的看法：首先，十六、七世紀時，德國文化程度不及法國，故改隸後兩州居民自然漸染相對高級的法國文化。其次，萊茵河左岸的住民本來崇尚活潑自由，與法國國民性相近，而與德國人拘謹嚴肅的國民性相遠。最後，德國治理二州採取同化政策，事事加以干涉，不如法國治理政策的開明平等，愈干涉則愈生反感，愈防範則愈招攜貳，德國人所以不能終有二州，算是咎由自取。

記得當時老毛奇 Moltke 將軍有句話，說道：「亞爾薩斯、洛林過得五十年才算真是我們德國的領土呢！」他的意思也是認定了這塊肥肉不是很容易吞得下去，不恰恰到了第四十九年就要吐卻出來，毛奇的話竟成識語了。……俯望新舊兩街，互相仇視之德法兩民族雜居於此，究竟至於何時方能捐除宿恨，而實現真正的親善呢？處在利害相反的地位，雖骨肉可以變成為仇敵；處在利害相同的地位，雖異族可以變成為兄弟。今

⁸ 詳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北：海峽學術，2002 年），頁 172-177。

處在利害相反的地方，雖日日大聲疾呼融和親善，此無異於緣木求魚。

(《環球遊記》，頁 31-33)

以亞、洛二州的遭遇，對照殖民地臺灣的歷史命運，林獻堂此番比附，竟成了一段關於臺灣的「國族寓言」——德國人不能終有二州之因，與日本人不能保有臺灣之故，竟有多處巧妙吻合：在於國民性懸殊，在於採取低度文明強制同化高度文明的殖民政策。因此，林獻堂也像毛奇將軍般，早已預見日本人難以吞得下臺灣這塊肥肉，縱使過得了五十年。林獻堂的這段論述，竟成了一語成讖的「預言」與「寓言」。他批評了日本殖民者的癡心妄想：「處在利害相同的地位，雖異族可以變成兄弟；今處在利害相反的地方，雖日日大聲疾呼融和親善，此處無異於緣木求魚。」同樣地，也擋了後來的國民黨統治者一記響脆的耳光：「處在利害相反的地位，雖骨肉可以變成為仇敵。」林獻堂的高瞻遠矚與苦心孤詣，身為異族的日本殖民者視若無睹，而戰後繼日本人來到臺灣的同文同種、骨肉之親的國民黨統治者也是充耳不聞。這項預見之巧合，充其量不過是歷史的弔詭罷了。觀察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德國從囂張跋扈，不可一世，到損失慘重，民不聊生，林獻堂更不忘以德國為借鏡，為軍國主義提早奏起輓歌，以收長自己志氣，滅敵人威風的效果：

嗚呼，昔之謀拓殖民地者，今成負債之國。昔之繼續攫得土地者，今反失去土地。昔之恃其軍力，為外交之後盾，以恫嚇敵國而謀奪得土地及商業上之利益者，今則海軍完全消滅，陸軍亦限定其至多之額，不得超過十萬。昔之雄視世界，不可一世，而有侵略之野心者，今則自顧不暇，而亟需整頓其內政，以再造其國家之新生命也。嗚呼，軍國主義之末路如是，而可不戒之哉。(《環球遊記》，頁 56)

美國獨立之端緒，無不發源於波士頓 (Boston)，因此有關獨立的遺跡，亦較他處為多，林獻堂按圖索驥，「感慨徘徊，歎歎久之」。《環球遊記》中，林氏不煩費詞地細細勾勒美國獨立始末，剖陳獨立戰爭的遠、近因。首先，他肯定十七世紀初（1620 年），因避英王苛政，搭乘「五月花」號飄洋過海，為謀利

益、求自由而輦路藍縷的美國開國先民：「蓋當日英王之壓逼新教，遂使愛自由之清教徒，不得不出奔異國，以圖自立。」，「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襟懷無限光明俊偉，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環球遊記》，頁 84）至於獨立戰爭的導火線則源於一七七四年的「茶稅事件」。「蓋當日英廷徵苛稅於殖民地，人民憤怒，大起反對。人民抵抗益力，相約不用英國製造品及英之茶葉，時有茶船三艘，新自英國開來，泊於港內，市民七人塗面易服，為印第安人之裝束，夜襲英船，悉取其茶入波士頓，因而衝突遂大肆殺戮，於是全殖民地鼎沸，而戰爭即從此始矣。」（《環球遊記》，頁 83）獨立戰爭雖為苛徵茶稅而引起，然而「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林氏剖析遠因有下述四端：其一，英王以特許狀認可移墾美洲者得領有土地權，卻未許以自治權，故任官設職全由英王委派英國人，殖民不得任職。然殖民既多來自英國，富於自由民主的思想與自治的能力，故久蓄不平之氣。其二，殖民地生產力與商業逐漸發達，母國徵稅極苛，所得賦稅全歸英國，殖民無支取權。復以法律獨厚富者，平民永無平等之事，平民叢怨益甚。其三，英王對殖民採愚民政策，殖民益憤。「殖民地無高等教育，其所設學校，但備普通學科，殖民以為請，知事不允，蓋懼殖民具有學問，則智識日高，將來或至獨立，不願受壓制。」（《環球遊記》，頁 84）其四，英王又發航海禁令，殖民地生產物只許供給母國，禁止殖民將商品輸出他國，英商得以上下其手，任意剝削，而殖民生計益困。由於英王殖民政策的錯誤，對美洲殖民地予取予求，片面壓抑殖民之自由平等與自治權，故林氏從美國獨立事件，得一歷史教訓：

觀以上原因，可知美國之有今日自由，成為泱泱大國者，皆英王促其購取者也。向使非有英王之壓制，則彼十三州之殖民，方且耕田鑿井，自安於不識不知，安得有其獨立之思想哉，此則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余亦曰「生於壓制，而死於喚咻也。」（《環球遊記》，頁 84）

華盛頓為美國首都，為美國政治中心，其中總統官邸名曰「白宮」，建於一七九二年，「宮凡二層樓，頗渺小僅類富豪之室」。林氏藉寫白宮的小巧樸實，幽雅可愛，極言其美麗宏大不及臺灣總督官邸甚多，襯托出大總統「自居為國民公

僕，不敢絲毫自侈」，「令人不得不歎平民政治樸素之風，其所謂平等，真乃實行而非徒作美名也。」（《環球遊記》，頁 78-79）先貶後褒，前後對照之下，實藉寫官邸之規模，以凸顯共和國平民政治之美善，並貶抑臺灣總督殖民政治的專制囂張與好大喜功。

（二）棄地遺民的悲憤・坎坷的臺灣自治（獨立）之路

見賢思齊，見不賢則內自省。自負於擁有相較於日本統治者來得高度而優秀的文明，卻難免淪落到被殖民的噩運，林獻堂並不昧於這項殘酷的政治現實。除了檢討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外，他也不諱言地批判滿清朝廷的顛頽腐敗。因此，旅遊其間，凡耳接目睹中國文物與華人同胞，無不感慨良深，繼發亡國遺民之憂思。走過錫蘭、新嘉坡、美國、加拿大等地，看到華人在外的備受歧視與差別待遇，有待華人開發，則要之，無則禁之，打工移民備受排斥，觀光旅行亦遭種種刁難，不禁喟嘆弱國之民的悲哀：「唉！人民無政府為之保護，到處被人看作機器，要則用之，不要則棄之，良可慨也。」（《環球遊記》，頁 4）極度的失望沮喪下，林獻堂還是抱持樂觀，他不斷在歷史長河中披沙撿金，他以德國人勇敢精進的國民精神，故能在戰後力圖圖治，迅速復甦，藉以期勉國人：「蓋凡國家偶有失敗，而受異族壓逼，其國民之精神即萎靡不振，則其國家亦永無振興之一日。若再接再厲，勇往直前，有此精神之國民，現在雖處於失敗之地位，將來必有復興之一日。」（《環球遊記》，頁 53）然而，最令何以堪的，是見到散落海外的中國文物。參觀位於德國柏林的威廉一世宮殿，見宮中軍器陳列館藏有八國聯軍後從中國取得的戰利品之一——清國軍旗二百餘枝，不禁義憤填膺：

最可恨者，就是二百餘枝的軍旗皆完好，無一枝受過子彈打破者，這明明是不戰而委諸敵人者也。當時清兵之怯懦腐敗，於此表現無遺矣。真是令人欲笑不得，欲哭又不得也。（《環球遊記》，頁 52）

而在當時荷蘭首都海牙（Hague），參觀女王避暑離宮時，見器物陳列室藏有一批中國刺繡及繪畫，刺繡雖非上品，尚不失中國之體面，至於繪畫，則極盡醜

化漢人形象之能事，使林氏異常反感：

至於繪畫，是使人一見欲嘔。不解何處尋此拙劣畫工，其畫之不佳，自不待言，而所畫中國之各種風俗，有鳩形鵠面之吸阿片者，有纏足之美人，有不穿衣辮尾累累如毛蟲之勞動者，奇形怪狀真是難看，似此不但辱沒中國的美術而已，並留漢民野蠻的印象於異國宮中永久不能磨滅，斯為可恨耳。（《環球遊記》，頁 62）

遊於美國華盛頓的紀念塔，見塔中收藏各國頌揚美國國父華盛頓的鑄石銘文，其中得自中國使館的銘文，其中竟有「華盛頓視陳勝吳廣有過之無不及」的題詞，林氏對此不倫之比附，深不以為然，並批駁道：「駐美國之使臣，不知美國之國情，實屬可恥，而不知建國之大偉人華盛頓，則尤為可恥，蓋彼僅識陳勝吳廣叛秦，華盛頓叛英，不過一失敗一成功而已，何其無智若是耶？嗚呼，一石雖微，而關於國家之體面則甚巨，豈可不慎之哉！」（《環球遊記》，頁 79）而博物館所陳列關於中國的文物，最使林獻堂念念不忘的，竟是「滿清西后之肖影」：

滿清之腐敗，大多受此老婦之賜。記得當其囚光緒帝，殺六君子，痛恨國家維新之際，何等赫奕威嚴，那知今日家亡國破，其尊貴之肖像，在此作古董，受千萬人之笑罵也。（《環球遊記》，頁 79）

溫文儒雅，老成莊重的林獻堂，在異國親見前朝遺物，撫今追昔，不禁痛心疾首。當時情緒激動莫名，日後修文措辭，仍見悲憤難抑，諸如「可恨」、「使人一見欲嘔」、「令人欲笑不得，欲哭又不得」、「可恥」、「受千萬人之笑罵」等遺詞用字，一概直截了當，不留餘地地衝口而出。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當時滿清已遭革命傾覆，被民國所取代，但中原板蕩，孤懸海外的臺灣被迫淪為異族殖民，時局又是何等紛亂。折衷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因環球旅遊而視野豁然開朗的林獻堂，既體察臺灣人的悲苦現實在先，復驗證先進國家的理想現況於旅行之後，其憂心愀愀見於言表，無怪乎林獻堂的《環球遊記》竟也是一篇篇深富微言大義的亂世怨章，亡國哀音。

有關林獻堂對於日人治臺政策的批評，隨著殖民時間的推移和個人閱歷的增長，林氏既動見觀瞻，也動輒動咎，故其言論實有日趨謹慎隱微的情形。這或許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苦衷使然。然而，透過旅臺日人作家佐藤春夫（1892-1964）的旅臺遊記⁹，倒是意外而珍貴的補充了林氏早期直言不諱的思想印記。一九二〇年六月底至十月中旬為止，活躍於日本大正時期的知名作家佐藤春夫，受邀到殖民地臺灣進行長達三個多月的環島旅行，返國後陸續發表了十三篇與此行相關的遊記。其中發表於昭和七年九月、十月號《中央公論》的〈殖民地之旅〉，該文記述十年前旅臺造訪霧峰林家，與時年四十歲的林家主人林獻堂的一段對話，直露地呈現林氏遺著裡難得一見的「肆無忌憚」：

……恕我肆無忌憚地說，我們對日本政府以及全體日本人，無論如何，都抱著十二分的信賴。這一點我先言明，但對被派遣到這邊陲之地來的官員，不管他是多麼有名的高官，對其手腕及人格等，我們都屢屢無法不感到不滿。……總督閣下在赴任時都會對本島人的政策大方針有所言明，有的說是：內地人、本島人平等；可是下一任的總督閣下又變成親和；以為決定親和了，再來的總督閣下卻又說是同化。……若說強要本島人同化到內地人去，那我想本島人是沒那麼容易認同的。何故呢？因為，人在本性上都具備有向上之心，而本島人早已擁有自己是文明人的自負。還有，肆無忌憚地說，本島人有著自己比來臺灣的一般的官員或商人還要具有高度文明的自負。這樣本島人，要他們把自己高度的自負捨棄，去同化於比其低度的文明，這種事，在人的本性而言是絕對做不到的。……不客承認的是，現在在本島，內地人的確擁有政治地位的優越性，我也充分地尊重。但是，政治地位的優越，未必意味著文明的優秀。¹⁰

漢文化認同堅定的林獻堂，完全聽得懂日語，卻不願意使用日語，全程透過通譯溝通。無視於警察局官員的在場監聽，對於備受總督府禮遇，來自日本中央

⁹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出版社，2002年）。

¹⁰ 同上註，頁331-333。

文壇的文學家佐藤春夫，林氏大膽提出對於總督府治臺政策的尖銳質疑與否定。林氏態度雖然備極誠懇與禮貌，但不卑不亢的論辯內容，使得佐藤不得不迴避總督府所推動的同化論與平等論，而「另立友愛一說」，主張「在其立腳點上，訴諸人類同志的友愛」。佐藤雖然同情臺民處境與尊重漢文化，但未能深刻感受臺人的迫切痛苦，林氏一針見血地說道：「處於痛苦狀態這邊的切身焦急的程度，您在無意間把它疏忽了。這是您堂堂正論的高見最大的遺憾呢！」此說的緩不濟急，被林氏一語道破，佐藤不僅毫無招架之力，而且相當狼狽不堪：

我的論敵，從頭到尾，看來都是重複社交性辭令。卻在無意間，短劍一閃讓我覺得自己所論的致命要害被一剔而破。我就如同一條大蛇的屍體似地長長地橫躺在那裡，不得不把自己的怪論的殘骸往自己的胸中收藏而感到無限的難過。¹¹

林氏過人的膽識與言論，不僅令處於政治地位優勢的佐藤春夫折服不已，更為其處境擔憂，甚至事隔多年才執筆為文，都不免在文末留下一筆作者附記：「事雖多實錄，無奈是十年前的記憶，而且加上行文虛實參半，切望莫因此拙文而有累及任何人的情事。」（佐藤春夫，頁338）佐藤春夫的委婉曲筆，對照林獻堂的「肆無忌憚」，更見林氏無畏於總督府的高壓統治，對於漢文化立場的堅定自信與威武不屈。此外，戳破日本殖民者假同化之名，行區別與歧視之實的假相後，臺灣知識分子們，如蔡培火在〈給日本國民書〉¹²中，即慷慨激昂地發出痛苦的控訴與怒吼：「台灣的官僚，惡用其特別立法權（即六三法），施行極端以母國人為本位的榨取政策。……僚稱依一視同仁的聖旨，以同化主義作為治台的方針，其政策之第一步是採取國語中心主義，在政治上，社會上即先塞住我們的嘴，使我們不能講話而成為無能力者。……噫！同化啊！以汝的名而行的國語中心主義，已將我們的活動能力加以抑制，我們的人材概歸無能化，舉凡政治的社會的地位，非任令母國人獨佔不可。因此，後藤新平的八十年同

¹¹ 同上註，頁337。

¹² 見蔡培火著，張炎憲編，《蔡培火全集三：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下）》（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頁124-128。

化說，可以解釋為使我們永久作奴的秘策。」以下即為蔡培火根據當時（昭和二年，1927年）所調查「台灣各種高等學校在學內台人學生人數比較」的結果：

台灣高等學校	內地人學生四七二	台灣人學生七五
台北醫學專門學校	內地人學生一三三	台灣人學生一五三
台北高等農林學校	內地人學生二〇八	台灣人學生一三
台北高等商業學校	內地人學生二一八	台灣人學生一四
台南高等商業學校	內地人學生八五	台灣人學生五〇

由於充分體察到這般由來已久的殘酷現實，林獻堂早於一九一四年，即與中部士紳集資發起興建臺中中學（後改組為州立臺中第一中學），以專納臺人子弟為條件，破天荒地向總督府提出捐資興學的請願。當時臺人有捐資的自由，但無興學的自由，林氏等人此舉，無異為被殖民者向殖民者要求教育平等之運動。此外，發軔於一九二〇年年底，歷經十五年，號稱臺灣民族運動史上的畫時代事件——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更是林獻堂傾盡心力，親自奔走，有以促成的民族振興大業。葉榮鐘曾剖析臺灣民族運動的產生，實以民族情感為直接動機，最主要是對於總督府的異族統治與不平等待遇的不滿，後來再受到梁任公的感召、日本自由主義、「祖國」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及世界局勢的演變所影響。¹³由於議會請願運動完全以標榜四民平等的日本憲法為據，藉以抨擊總督府治臺政策的乖張違憲，並且以林氏的聲望、人品與財富實力為號召，登高一呼，聲勢壯闊。而且裡應外合，既能糾結東京臺灣留學生組織與本島力量，復能厚結日本中央政壇以牽制臺灣總督府，故予以歷任臺灣總督相當大的壓力。無奈總督府，恩威並施，極盡籠絡威脅與挑撥誣謗之能事，復以臺灣文化協會分裂，激進階級運動與溫和民族運動者，水火不容，故縱使林獻堂有心也無力回天。遂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召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相談會」，會議當天由林獻堂擔任議長，會中作出以下議決聲明：¹⁴

¹³ 見葉榮鐘著，〈初期臺灣議會運動與日總督府的態度〉、〈林獻堂的事蹟與臺灣抗日運動對談會紀錄〉，收錄於氏著，《臺灣人物群像》（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年）。

¹⁴ 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編注，《灌園先生日記（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憶自大正九年未開始運動以來，至今十有五年，提出請願於帝國議會者十有六回（臨時議會二回），其間波瀾重疊，枝節橫生，同志受盡艱難，供盡犧牲。歷代總督莫不加以種種壓逼以期潰滅，甚至公然勸告中止運動者亦大有其人，而我同志毫不稍屈，再接再厲（勵）以至今日，其苦心孤詣之情實為足多矣。……蓋自中川總督蒞任以來，直接、間接勸告中止，總合其要點：一、際此非常時之秋，當大同團結；二、勿使人誤解為獨立之運動；三、免授人反對改革地方自治制之口實云云。討論三時間之結果，其決議「我等鑑於最近內外之情勢，對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中止」。

終日治五十年期間，儘管林獻堂以臨淵履冰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管理繁瑣家業外，更熱心投入臺灣民族運動，以謀求臺灣人集體的福祉，但還是遭受過數次「白色恐怖」的株連與驚駭，幾度虎口逃生，例如「治警事件」（1923）、「祖國事件」（1936）、「《環球遊記》事件」（1942）等。一九三六年春三月，林獻堂（五六歲）參加臺灣新民報所組織的「華南考察團」赴中國參訪。在上海接受歡迎時，因席上致詞有「林某歸還祖國」之語，被日本間諜獲悉並轉報臺灣軍部，五月由總督府耳目《臺灣日日新報》揭發此事，並大張旗鼓地予以撻伐。其時為「七七事變」之前一年，日本軍部侵華計劃殆已成熟，軍人氣燄囂張，驕橫狂妄。臺灣軍部參謀長荻洲立兵見林獻堂「言詞失當」但尚不能繩之以法，心有不甘並想殺雞儆猴，遂唆使日本極右派日本生產黨人賣間善兵衛藉機修理林氏。是年六月十七日，當林氏應臺中州知事之邀，參加在臺中公園舉行的臺灣始政紀念日慶祝遊園會時，賣間趁機接近並掌摑林氏，以逞其公開羞辱與教訓之目的，即所謂「祖國事件」。「《環球遊記》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對英、美宣戰，時局進入太平洋戰爭緊迫時期，「鬼畜英米」的口號已經在全島喊出。一九四二年六月，林獻堂（六二歲）陸續接到臺中州警察部長松山與臺中州知事森田俊介的傳話，謂《南方》雜誌重刊林氏舊作《環球遊記》，有人投書警察部，指摘遊記過譽敵人（英、美），實屬不當。

林氏為求免禍，緊急進行疏通。經日本友人宮原武熊建議，辭去臺灣總督府評議員及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等公職，以免極右派在臺日人仇視。其次，對森田臺中州知事極力陳情，以取得長谷川總督的諒解。最後，林獻堂在官方壓力下，不得不作妥協與彌補動作。首先，在《南方》刊登一則〈林灌園啟事〉，表明「環球遊記係十餘年前舊稿，思想固陋，而登載於今日，殊不合時宜，無異夏裘冬葛，不但無益於讀者，常恐反招誤解之虞，故就此號中止。」¹⁵其次，應臺中州森田知事建議，寫了〈十五年後之感想〉，應石田憲兵司令官囑咐，寫了〈大東亞戰爭之意義與島民之覺悟〉¹⁶，之後又應長谷川總督之命寫了一篇有關個人國家觀的文章，以交心表態，並逼林氏盡力於皇民奉公會。再加上主要投書者賣間善兵衛偷割林獻堂土地上的稻米，被林氏向法院提出訴訟，為求息事寧人，遂親至林府謝罪後，此一事件方告驚險落幕。¹⁷

林獻堂《環球遊記》所揭載的政治考察心得與理想，實影響其爾後民族運動甚鉅。他站在同是被殖民者的立場，充分認同與肯定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成績，反對英人對愛爾蘭政爭的片面批評。尤其是比利時、摩納哥公國，以小搏大，堅持獨立自治，脫離大國附庸的成就，更令林氏欽羨不已，而不由興嘆：「可見世界無一土地、無一民族不可獨立的，唯視其自治能力何如。」而見羅馬帝國因驕奢荒淫而敗，因異族入主而亡，幸有義大利三傑的中興大業，復有無數愛國志士奮鬥不懈，始能挽狂瀾於既倒。故深感「凡國家之能獨立與否，先視其國民有無獨立之精神，若其國民有獨立之精神，雖羅馬之亡仍能成為意大利之統一，若其國民無獨立之精神，如猶太永為人牛馬奴隸。」證諸林氏畢生推動的民族運動，例如推動六三法案撤銷運動、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組織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並擔任顧問，無非是參用先進獨立國家的歷史經驗，欲

¹⁵ 林獻堂，〈林灌園啟事〉，《南方》雜誌第一五六期，1942年（昭和17年）7月15日，頁28。收於《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八：南方》（台北：南天書局，2001年）。

¹⁶ 林獻堂，〈大東亞戰爭之意義與島民之覺悟〉，《南方》雜誌第159期，1942年（昭和17年）9月1日，頁1-4。收錄於南天書局編印出版，《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八：南方》（台北：南天書局，2001年）。

¹⁷ 事件始末，參見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二期，1998年6月，頁14-16。葉榮鐘，〈林獻堂年譜〉，收於氏著，《臺灣人物群像》（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頁146-147及頁157-159。

透過溫和緩進手段，先向殖民政府爭取臺人自治的權利；至於擔任東京留學生團體新民會會長、集資興辦臺中中學、膺選為臺灣文化協會總理、《臺灣民報》成立公司組織的首任董事等，乃著意致力於啟蒙與培育臺人獨立精神與自治能力。終其一生，因「勿使人誤解為獨立之運動」、「免授人反對改革地方自治制之口實云云」，而未敢標舉獨立之口號，然其苦心孤詣，實日月可鑑。

四、結語

林獻堂就其行旅一年期間，以來自殖民地臺灣的一介渺小旅人的特殊身分，長期浸潤於西方世界裡，在「借來的」時間和空間中，沈潛、觀察、思考與想像的結果如下：

其一，延續清末梁啟超「新民論」的致力於改造國民性的思路，林獻堂就東西方文化差異之要者——民族性的比較部分，發表他的看法。他先從日常生活的觀察中，就西人過度提倡個人主義的結果語多保留，對於洋婦愛犬甚於愛其子女，甚至不顧飲食衛生而同桌進食的情形，覺得不可置信。見西人排隊候位，循序以進的情景，則肯定西人民族性之能耐，比東方人民族性的躁急，更勝一籌。再從西人國族歷史的檢視，以比利時為例，充分肯定西方人的重自由甚於東方人的重利。復從同是西方人的英、法兩國的民族性予以釐清，覺得英人的勤勞敏捷與法人的從容不逼，各有其佳處，然兩者共有的「絕不抱有人種偏見，人人皆能自由」的民族性，則多加肯定。最終，愛深責切的林獻堂還是反求諸己，將矛頭指向我族，引述梁啟超的說法，警覺中國人不懂休息的道理，事倍功半；不能有高尚的目的，營營於眼前近利；中國人立言坐行皆儀態不雅，秩序混亂，與西人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東西人種之強弱優劣於此可見。吾人以為，林氏對於西人民族性的觀察與評價部分，頗為客觀可取，但在評斷中國人的民族性部分，顯然多承襲梁啟超說法，因國勢的江河日下而生卑弱不如的想法，似有苛責太過之嫌。

其二，親炙先進國家，因現代化的相對遲到而生的現代性的考察部分，來自東方／傳統／落後的殖民地臺灣的林獻堂，一旦闖進西方／現代／進步的民

主國家，並且進一步見識到歐美／民主主義的現代性與日本／殖民主義的現代性的差別之後，雖是驚駭萬分，愛恨交加，卻也能在斟酌、商榷後，提出頗有見地的批評。他充分認同現代化新國民的講究衛生效率，養成運動習慣以強健體魄，車中讓坐老弱婦孺的美德，尊重婦人並提昇婦人地位，熱心參與政治，執政者平民化、自奉為公僕的親民表現，尤其在海德公園上了一堂民主課程，大開眼界後直呼「真有大國民之襟度」、「真是言論自由」，最讓林獻堂稱羨不已，也道出了身為殖民地臺灣人的悲哀。然而，就高度資本主義化、機器化的現代文明，林獻堂深刻感受到人成為機器的奴隸的不安，與貧富益形懸殊的堪慮。

復就取鑑西方以規模臺灣民族運動方面，在考察前殖民地國家，獨立成功的政治經驗與歷史教訓後，從埃及、愛爾蘭、義大利的經驗，讓林獻堂深刻體會唯有上下一心同仇敵愾，不屈不撓前仆後繼，始能大功告成。而小國寡民的比利時和摩納哥公國的經驗，則使林獻堂意識到「世界上無一土地、無一民族不可獨立，唯視其自治能力何如」。美國獨立成功，乃英王苛政而咎由自取的教訓，則充分證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生於壓制，死於喚咻」的道理。至於涉及法、德主權紛爭的亞爾薩斯、洛林二州的歷史遭遇，則彷彿是一則有關於臺灣的「國族寓言」，林獻堂的評論，既一語成讖地預言了日本殖民臺灣的終將敗北，也狠狠擗了後來的國民黨執政者一記響脆的耳光。

最後，雖自負於擁有比日本統治者來得優秀的高度文明，卻難免淪落到被低度文明的殖民者統治的噩運，林獻堂並不昧於這項殘酷的政治現實。折衷於理想與現實之間，他藉由耳接目睹海外中國文物的機會，一方面嚴詞批判滿清官僚的顛頽腐敗，迫使國家走向敗亡之途；一方面也不忘藉西方國家獨立成功的歷史經驗，以教訓日本統治者的癡心妄想與殖民政策的不仁不義。

從二十萬言的《環球遊記》抽絲剝繭後，吾人可以窺見作者林獻堂以實際旅行歐美的考察記錄，蘊含個人的識見、學養與思想情感，故為研究林獻堂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尤有甚者，藉由這部詳實考察先進國家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報告，林獻堂以夾敘來議的筆法，透過細膩觀察，具體而微地捕捉他者在日常生活的種種風景，藉收異己與自我民族性的比較。而東方／傳統／弱勢的被殖民者，與西方／現代／強勢的民主國家的現代性的參差對照的再現策略

下，既取譬中西歷史教訓，以茲鑑照，復能指桑罵槐，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充分吐露殖民地臺灣人的悲哀。諸多因旅遊他者之域，而衍生的文化想像、國族論述，豐富而多元地輻湊在微言大義的字裡行間，其人意欲覺醒與教化國人，並試圖指出國族未來道路的苦心孤詣，故凡「中國前此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凡例》）無關宏旨，無補於利用厚生，以振興國族者，悉予淡化處理。其文化意義與歷史價值在此，遂使《環球遊記》能夠超越一般旅遊文本的文學價值，讀來格外沈重，也異常豐厚。